

编者按：

1988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1926-2021),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尘封的档案里,发现并随即系统整理了《贝德士文献》——迄今批量最大、最完整的南京大屠杀英文原始文献。自此,章先生以学者的良知、教育家的担当,将余生投入这场“为历史作证”的学术长征,推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1937.11-1938.5》《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多部里程碑式著作。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本期,我们通过刊载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的吴梓明先生的追忆文章,纪念章开沅先生逝世五周年,并致敬其“以学术护正义”的不朽贡献。

“唤醒”贝德士文献： 章开沅先生 与他的南京大屠杀研究

——从章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说起

□ 吴梓明

一 与章先生的友谊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也牵动起我对挚爱的老前辈章开沅教授的怀念。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的不凡成就,不仅在于其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开创性学术贡献,同时也体现于他在中国教会大学史和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中所发挥的领航者作用。

此刻,我忆起我们30多年的友谊,也忆起章教授在华中师大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和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还有,尽管章教授未曾接受过任何正式的海外大学教育,他的学术成果却得到国际的肯定、获得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日本创价大学与美国西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和荣誉博士头衔。

二 卓越的历史学家与教育家

何以,“唤醒”《贝德士文献》的是章开沅先生?

章开沅先生的学术轨迹,从来不是单线深耕,而是不断向外拓疆。早年治太平天国史,继以辛亥革命成名,20世纪80年代再伸触手,探入文化史,并试验现代化理论,同时深耕教会大学史。正因这跨越的“转身”,他才会远赴耶鲁神学院搜读十三所新教大学的档案,也才会在那里,“偶遇”贝德士文献——若固守一隅,便无此机缘。

作为一位卓犖不凡的历史学家,他常强调要“通过参与史学来尊重历史、超越历史……”。何谓“参与史学”?据马教授忆述,章教授一贯强调历史学家要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仅要书写历史,还要参与创造历史,为人类正义事业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要“尊重历史”,必须尊重历史事实,“超越历史”,须跳出历史恩怨的心理情结,以求保证研究过程的理性与客观性。章教授尤为注重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元的视角来研究历史事件,从而揭示真实的历史事实。这恰好也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所倡导的“改革开放”与“实事求是”的精神。

章先生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1985年春,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刘子健教授来访,向章提出一个挑战,说:“现在是重新审视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的好时机……而你是带头研究的最佳人选。”刘解释道:“第一,你原是教会大学的学生,现在工作单位前身也是

初识章先生是在1989年,恰逢其任华中师大校长。当年有幸获教授邀请参加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教会大学与中西文化”。本人是唯一出席会议并发表论文的香港代表。自那时起,本人怀抱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热忱,一路追随章教授30余年。

继首届研讨会后,我亦获邀参加分别由南京师大和四川大学所承办的第二和第三届研讨会。1991年,我更有缘于美国耶鲁大学与章教授和马敏教授再相逢,在共同生活的6个月里,细听章教授分享他在1988年开始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经历,当时,他前往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检索中国教会大学的档案全宗,竟然发现馆内保存了《贝德士文献》专档。贝德士(Minor Searle Bates)是章教授在金陵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在其专人档案中保存了大量南

教会大学,对教会大学有较亲身体验。第二,你现在是大学校长,对学校有总体的把握,比一般人更有利于研究教会大学。第三,作为历史学者,你既有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更有责任来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这块空缺。”

章教授欣然接受了这挑战。年逾六旬的他虽任华中师大校长,但仍抱有出国访学及从事研究的意向。1990年夏,他赴美国进行为期4年的学习,先后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客座研究员(1990-1991)、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1991-1992)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1992-1993)。

如上所述,访学期间,章教授发现了大量关于中国教会大学和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档案资料,特别是耶鲁大学图书馆中存有许多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献。

章教授在耶鲁大学一年后,便开始着手对贝德士文献展开深入研究,将其余生投入到对贝德士生平历史研究中。贝德士在金陵大学任教30年(1920-1950),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者。在日本侵华期间,贝德士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参与抗议日军暴行,坚持开放金陵大学校园,力求保障南京人民的生命安全。战后贝德士更以目击证人身份出现在东京战犯审判庭上。贝德士文献研究既有助于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发展,也有助于对中日战争历史事实的取证与还原。

而章教授也因贝德士担任国际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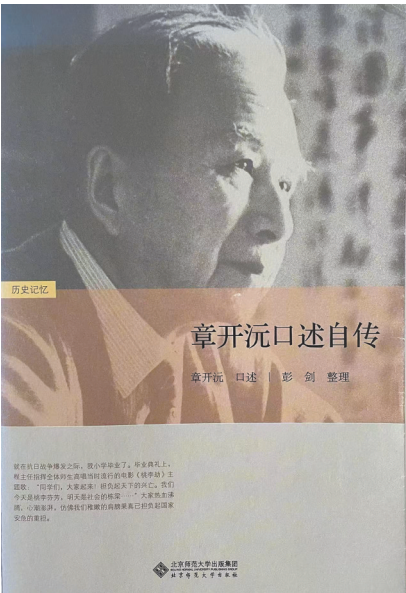
三 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在中国教会大学史这样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内,章先生也无疑是一位极具开创性和影响力的领导者。在首届研讨会上,章教授呼吁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寻觅新方法,也强调将其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的重要一环。20世纪90年代已有三篇博士论文展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多维视角,分别是:北京师大史静寰的《登州文会馆与燕京大学——近代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普林斯顿大学徐以骅的《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以及南开大学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他们的研究体现了对档案材料的有效利用,以及对章提出的拓宽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维度的积极探索。

在研讨会上,章教授更率先提出

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他鼓励学者将中国教会大学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进而把其研究作为探索近代中西关系史和东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路径。这是对保罗·科恩(Paul Cohen)所提出的“中国中心取向”的回应,即关注教会大学的中国因素,在中国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以中国视角重述教会大学的历史。

继1989年章教授发起首届研讨会后30年,正值其93岁之际,章教授再次组织30周年的纪念活动。作为参加过首届和30周年大会的学者,我们共同见证章教授在过去30年来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所创造出的珍贵精神文化财富。在会议上,我们也发现,章教授虽年事已高,但依然出席大会的开闭幕仪式、两场盛大宴会和多场主题会议在內



《章开沅口述自传》章开沅口述 彭剑整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大屠杀的原始资料。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将其命名为《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章教授复印了1000多页文献资料,带回中国展开他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在美期间,我亦与章、马两位教授分别合作完成两篇学术论文。这也成为我们日后在该领域合作的良好开端。

1993年12月,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我有幸邀请到章教授作特邀嘉宾及总结发言。1995年1月,我们再次邀得章教授与其夫人作为崇基学院黄林秀莲访问学人重临香江,适值当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香港三联书店计划出版《南京:1937.11-1938.5》一书,三联编辑亦趁章在港访问时,商讨确定该书的出版、内容和插图等细节问题,让该书能在极短时间印刷出版。

员会主席时掌握南京大屠杀的一手资料,成为了中日战争史研究的专家,先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南京:1937.11-1938.5》《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尤其是最后的一书,记录了章教授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过程,包括他是在美国耶鲁大学于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时发现了“贝德士文献”内藏有不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手英文资料,其真实记录了贝德士曾在日军屠刀下无私救助中国难民的事迹;还有后来章教授两次在日本东京巧遇东史郎、亲耳听到东史郎忏悔的故事;亦包括1997年在东京参加南京大屠杀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章所发表的主题演讲稿、2000年章重临日本关西巡回演讲的活动等。章教授还几乎每年都就贝德士和南京大屠杀研究成果在国内、日本和美国等地发表演讲或参加会议。2015年12月,已是89岁高龄的他仍坚持在华中师大发表“贝德士和南京大屠杀”公开演讲,讲述了同样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女传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的故事。南京大屠杀的经历给魏特琳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返回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家后不久,她便抑郁而终。在此要再提一句的是,上述所言的东史郎,章教授提及、曾于1981年和1997年在东京两次与对方遇上,而这位日本士兵东史郎,都在他面前进行了忏悔,令人动容。

的所有重要议程。36年前章教授所接受的挑战成为了其余生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尽管他悄然离我们而去,但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其烟烁思维将一直存留在我们的心底。

(作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武汉华中师大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广州市新时代民族宗教领域研究智库专家成员。本文相关研究英文报告文章-“A Tribute to Professor Zhang Kaiyuan: An Unusual Historian and Educator in China,” in Ng, Tze Ming Peter. Sinification of Christianity: The Case of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New York: IIHSD Press, 2021. 本文相关中文翻译工作谨致谢谢上海大学刘义教授及其博士生董慧莲。)

《广东简史》： 古今中外视野下的开放广东

□安东强

作为广东地方史研究的新里程碑,《广东简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25年)历经三年的编纂,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该书编纂启动之初,我曾参与讨论体例与主题等事宜,作为一名行内人当时就深感其难。难就难在要做好一篇全面叙述广东历史的大文章,既要纵贯古今,又须横通中外,还要以“简史”的体裁呈现出丰富而多元的历史内涵,非兼具史识、史才与史笔者难以有功。

幸好今天的学术研究,整体上已经进入一个集众研究的时代。若以一人难以有功的事业集合一个众人通力合作和个人所学长的编纂团队,在继承和吸收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上,又能融合学界最新的研究观点,在新时代的历史观指导下,必能推陈出新,树立一个新的学术里程碑。由李宜航同志领衔的《广东简史》编纂团队无疑就是一个优秀的学术表率。

从整体观照局部,讲述开放多元的大历史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具有编纂地方通史的学术传统。自蒋祖缘、方志钦两位先生主编的《简明广东史》于1987年问世以来,编纂一本新的《广东简史》已然成为令人望而却步的事业。即使蒋祖缘、方志钦两位先生后来的努力方向也是编纂6卷本的《广东通史》,2008年收入“岭南文库”的《简明广东史》基本是旧作新刊。“简史”之难,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多卷本“通史”之上,因为既要能“贯通”,还贵在“简明”。“简明”并非删繁就简之谓,而是简明而扼要的双重要求。以地方史叙述而言,如何能紧扣其简明而扼要的历史脉络,便不能仅就地方而言,需要从整体观照局部,必须要走出地方史的历史叙述,在古今中外的视野下讲述一个开放多元的大历史。这也是新刊《广东简史》的叙述特色和学术追求。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历史学,故而一时代也应有一时代的通史著述。这并非如坊间习称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为只要具备了当下时代的眼光,就能撰述出一部新的历史。更不是俗称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将历史叙述任意驰骋想象,想让历史人物和事件不受历史固有的时间、空间、制度的约束而随意演绎。历史叙述的时代发展,自有历史学自身学理与技艺的不断拓展,而非一味依托外部的熏染。

以历史叙述的时间范畴而论,新刊《广东简史》在古今两个时间边界上都有自然的延伸。以古而言,《广东简史》努力汲取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文明探源问题上突出岭南文化的组成因子,如关于磨刀山遗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析,可以与长江流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进行类型比较。在关于广东早期人类活动轨迹方面,不仅借鉴了基因学对“澳美人种”的活动轨迹,而且结合考古学关于屈肢葬习俗在岭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分析,揭示了岭南地区古人类的生活形态。《广东简史》对于史前时期人群在岭南地区的活动、生活习俗、文化遗迹的叙述,使得广东史前文明的考古学谱系逐渐清晰。这也是全书的一大亮点。

历史学不仅要“考古”还要重视“考今”

中山大学历史学的前辈学者朱谦之先生曾提出,历史学不仅要“考古”,还要重视“考今”。这是非常具有卓识的见解。以广东的历史地位和贡献而言,诸如“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和“改革开放先行地”的重要论述,都是要从“考今”的历史视野才能挖掘和阐释其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此前《简明广东史》仅仅叙述到1950年广东全面解放的历史,无疑留下历史性的遗憾,而新刊《广东简史》专辟一篇四章(即该书第五编)叙述新中国成立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广东历史,从各章内容来看尤重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及科教文化。这也得益于编纂团队此前完成过《广东改革开放史(1978-2018)》的学术积累。因此,《广东简史》确实称得上是第一部真正贯通古今的广东地方通史著作。

“一种中外视野的具体书写形式”

编写好一部《广东简史》,在拓展古今的时间边界之外,更重要的是具备新的中外视野。正如前面所言,应走出地方史的历史叙述,需要从中国史、世界史的视野思考广东的历史地位。在这方面,现代中国“新史学”提倡者梁启超曾有过深入的思考。

1905年,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



《广东简史》 李宜航等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之位置》一文开篇称“广东一地,在中国史上可谓无丝毫之价值者也”。因为“自百年以前,未尝出一非常之人物,可以为一国之轻重”,“未尝有人焉以其地为主,使全国生出绝大之影响”。这显然是“二十四史”的王朝史视角的评判。作为“新史学”开山的梁启超,就是一位打破王朝史叙事的史学革命者,他接着说:“还观世界史之方面,考各民族竞争交通之大势,则全地球最重要之地点仅数十,而广东与居一焉,斯亦奇也。”他进而梳理了自汉朝以来三千年广东在世界民族竞争、交通贸易方面的历史贡献,预言随着广东海路贸易的发达和粤汉铁路的修筑,作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换言之,要讲清楚广东历史必须将其置于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竞争、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交融互动的中外视野之下。

所谓中外不能简单等同于中国与外国,而要深刻理解一种内与外的文化差异与联动。梁启超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段,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从而将时间、空间与民族、政治体制演进纳于一种历史分期的标准。新刊《广东简史》固然没有简单套用这种分期标准,而是在时间维度之下,注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社会、民族、华侨等多个维度,扼要书写广东历史的演进特色。这些维度看似是分层分类叙述,然而以此来梳理广东历史,实质上就是一种中外视野的具体书写形式。

这是由广东历史的特质所决定的。从自然地理、水陆交通、文化交流等多个维度来看,广东始终处于中华文化与外来文明的枢纽地位,使得广东自身发展一直处于华夏文化南下与外来文化涌入的交冲地带。因此,《广东简史》从多维度叙述广东历史自然要讲明白这样一个开放而多元的历史进程:一、中华文明内部中原与岭南在国家治理、人群流动、文化交融等方面互动演进的历史;二、广东在中古时代中华文明与海上外来文明的相互影响;三、广东在近代全球化浪潮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事实上,这也正是新刊《广东简史》的学术创新之处。

以海路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历史叙述为例。从中国对外交通的大势而言,汉唐以前倚重西北陆路交通,即习称的陆上丝绸之路;唐宋以降海道日占优势,即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始终是数千年中国对外海上交通的活跃地域。若将《广东简史》各编各章所叙述的海路开发与海上贸易各节连贯来看,可以形成有系统的专史叙述,注意吸纳当前国内外最新的研究论述,并且不限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叙述模式,揭示出广东对外的帆船贸易在古代海洋文明和近代贸易全球化浪潮中的历史贡献,反映出一种国际学术前沿视野。这正是编纂团队多年来耕耘于海洋史研究的学术积淀。

与海上交通贸易紧密关联的还有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在佛教从海路进入中国及其华夏化的历程上,广东是最重要的地区,这也是中华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一大事因缘”。梁启超很早就指出禅宗六祖慧能是古代广东少数具有全国重大影响的人物,原因就在于此。后来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上,广东同样是最要的地区,也诞生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著名的近代思想家。正因如此,《广东简史》对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交融历史有着浓墨重彩的论述:无论是早期岭南地区儒释道文化的兴起与交融,还是佛教在岭南的风行与中古夷教的传播,以及西学东渐与广东人的新学酝酿与传播,乃至当代文化强省和科教建设,都呈现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广东形象。

总体而言,《广东简史》不仅着力于编写了一部贯通古今、涵盖中外的综合性通史,而且从各个历史层面进行多维度的细致分析,揭示出广东历史在中外视野下的多元意涵。这本书既为时下读书人提供了一个认识和理解广东历史的窗口,也为当代书写与宣传一个开放包容的广东形象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支撑。(本文作者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